

November 2014

##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Hasty Theorization in the Expans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 Unfinished Case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iness

Nan G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Gao, Nan. 2014.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Hasty Theorization in the Expans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 Unfinished Case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ines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6): pp.164-17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6/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文学理论扩容的实践走向与理论仓促

## ——文学与文学性的一段未了公案

高楠

**摘要:**文学理论扩容,已作为重要理论事实为各方面所接受。然而,对于文论扩容的理论阐释却很仓促,留下不少须予清理的混乱。文论扩容的理论要点是文学性与文学关系的争论,文学性成为文论扩入社会生活领域的范畴关键。而实际上,文学性范畴并不能承担这一理论分量。文学性对于文论扩容的提领作用是借助于文学边缘化说法而发生的,文学边缘化说法充满文学及文论精英的失落感,它其实是大众文化中文学走向的情绪化虚设。文论的现实社会生活扩容的理论根据应在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融通性、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同构性,以及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主体同一性。

**关键词:**文学理论; 扩容; 文学性

**作者简介:**高楠,本名高凯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艺术文化学研究。电子邮箱:chunfeiwang@163.com

**Title:**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Hasty Theorization in the Expans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 Unfinished Case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iness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literary theory has been accepted by all the related circles.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into it appear haste and leave much to be clarified. Central to the expansion is the argument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iness and literature, whereas literariness becomes crucial for social life to be included into literary theory. In fact, the concept of literariness itself is not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theory. The leading role of literariness in the expansion arises from the so-called margi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which reflects a strong sense of loss among the elitist thinking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However, the so-called marginalization is the emotional imagination of the literary trend in the increasing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popular culture. The theoretical base for the expansion of literary theory, the paper concludes, lies in the commensurability, the coterminous nature and the identifiable subjecthood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ality.

**Keywords:** literary theory; expansion; literariness

**Author:** Gao Nan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Literary Studei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art. Email: chunfeiwang@163.com

文学理论扩容是一个仍在实践地发生并且仍在热议的话题,而且一段时间内还要继续发生并且热议下去。<sup>①</sup>这是因为就文论研究实践而言,扩容已现实地发生,而就扩容的理论根据而言,它根系庞杂,关联文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文论扩容的现实实践根据是生活艺术化,其理论根据则是十年前曾热烈讨论的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中文学性对于文学的取代。文学性被列为文学理论研

究对象,发生了一个文学理论的主体理论属性与对象实践属性的双向漂移,即文学理论由文学研究向生活研究的漂移,及文论所研究的文学属性向文论所研究的生活审美属性的漂移。漂移中,生活性以文学性身份成为文论对象。这是事关学科领域的重大变动,它的作用远不止于对象变动,而是从对象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从命题到范畴再到理论话语模式的全方位的学科振荡。对这一

振荡,文论界的理论应对至今仍显得仓促。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文论向日常生活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扩容,其理论根据能否在文学性中求得着落。

## 一、文学的文学性与文学性的文学: 文学性争论的反思性回放

2004年前后的几年时间里,文学性问题随着生活艺术化的文化研究的展开而被烘热,这是一个引发于文学又向生活扩展的概念转换过程,其间的贯穿性思路并不复杂,即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性,而不断艺术化的生活也有文学性这种属性在不断地活跃。既然如此,研究文学的文学性的文学理论就可以也应该研究生活中的文学性。但问题在于概念的一般性承担有其普遍沿用的历史规定,那凝聚于概念的历史规定很难在现实应用中悄然消隐,或者说,凝聚于概念的历史意蕴难以因现实之用便轻易甚至信手地改变,这样的改变往往会造成理论混乱。文学性作为引发文学理论扩容的重要概念,就经历着因现实之用而轻易甚至信手地改变其历史意蕴的情况。

### 1. 文学性本义及转义

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最初提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批评,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等各种文学文体。其代表人物包括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艾亨鲍姆等。他们的基本主张在于找到并研究使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属性,或者,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种属性。经过认真的比较、研究与分析,他们认为找到了这种属性,这是一种制造陌生感的、通过一系列修辞手段来实现这种制造的对于语言的特殊使用,他们把这种被特殊制造和使用的语言属性称为文学性。他们找到了这种文学性之后,为使之成为纯粹的文学属性,便剔出文学中可以为非文学及其他各种生活现象所共有或分享的东西,比如文学情节、文学人物、文学内容等。经过剔除,文学的语言形式获得独立思考、研究及批评价值。这样一来,文学性研究的基本方法也就确定下来,即语言学方法,而隐喻、转喻、明喻、暗喻、象征等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则成为文学性研究的基本概念与术语。由此可见,形式主义者提出文学性这一核心命题的初衷及其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努力成果,都在于

把文学领域同其他领域区分开来,这是向着文学收敛的初衷及其努力。当时,形式主义批评派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初衷、作出这样的努力,在于他们活跃的当时,正是文化领域、职业分工领域、学科领域不断分化细化的时代,这成为当时极为活跃的时代发展趋向。领域的分化与细化,首先以不同领域的社会生活及学科实践方式展现出来,以领域间的差异性形成人们的领域差异感受,这样的差异感受在实践的进一步展开中不断地提升为人们的领域意识、领域理性,形成人们对于领域差异性的理论研究。这是切分式或分割式的研究,领域的纯粹性及特征性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要点。对以上领域研究的要点,余虹从文学性提出的角度作了精当概括:“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职业分化和学科分类相互激励,出现了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这些人必须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便在学科分类的现代知识格局中证明自己工作的合法性,进而在巨大的知识场域和职业市场上瓜分出并占据一个独立的领域”(3)。

不过,有意思的是,百年后,中国社会转型大规模展开之际,中国文论学界重拾文学性这一概念,但在将之用于文学及社会生活研究时,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性最初提出时的概念规定性,把这个向着学科领域收敛,从而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概念,转而向着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敞开,使它成为一个众多生活领域及学科领域均可分有并被认为是早已分有的泛化概念。文学性在这一收一放的转化中,概念本义被公然改换。

改换中,文学性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属性,并且它不再专属于文学。2002年之后一段时间的讨论中,对文学性进行本义改换的代表性说法,是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意指不断变化的范畴,与之相关的文学性也并不是可以确定的属性,它是“一种意识”,“一种知识学的建构”(马睿16)。由此,这种说法推导出一个意想不到但却鲜明的结论,即“正是文学性的游离,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文学性理论可以在文本之外去寻找文学性,而文学活动中的文学性可以对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性的界说采取一种反讽的态度,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相悖谬的现象”(冯黎明29)。这种说法把属于文学的文学性向文学之外游离作为一种可能性而提出,又作为一种必

然性来强调。在这里,文学性的范畴属性被非逻辑地理解了。范畴在逻辑运用中,具有一个重要性,即内涵的稳定的封闭性和面对现实的敞开性,并由此形成范畴外延的确定性与变动性。而范畴的这一定性又集中地体现为对象同类性及同类确定性。对范畴确定在对象同类性前提下的这种稳定又变化、封闭又开放的属性,黑格尔曾阐释说:范畴在每个类属中总意识到与它自身的明确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同样又指示着一个他者,“这他者当其存在时已消失而当其消失时已再生”(159)。范畴的这种稳定的消失与再生的性质,使文学性的变动性与建构性有了理论着落。不过,在文学性改换的代表性说法中,却有一个逻辑转换的困境,即何以形式主义批评学派所收敛凝聚的专属于文学的属性——文学性,竟在文学的历史演进中违反其对象同类性而成为对于文学的越界属性。文学独有,是文学性最具有根本性的规定,这是文学性范畴的由来,这也是文学范畴的逻辑界分。上述代表性说法的逻辑困境在于所谈是文学属性,同时却又把文学属性泛化为非文学属性。于是,推演文学属性的一套逻辑与推演现实生活的非文学属性的一套逻辑,在这里跳跃性地甚至是断裂性地对接起来。

当然,在这一跳跃性或断裂性对接中,代表性说法也进行了理由阐述,即:其一,当下知识分类原则和学科体系的走向崩溃,从根本上抽掉了文艺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其二,文化的当下性与生动性,抽掉了文艺学的文化合法性;其三,文体增生,文类界限的模糊,及写作与阅读的多媒介化,抽掉了文艺学的学科合法性(马睿 18)。然而,这样的阐述并没有把问题理清,却又使上述代表性说法陷入悖谬的或循环论证的逻辑中,即它用文学性的泛化来证明文艺学的非合法性,又用文艺学已然非合法,证明文艺学所研究的文学性也就必然泛化。我不否认悖论中对立逻辑之互为关系,但悖论逻辑是共时性逻辑,而代表性说法在这里所设立的文学性泛化与文艺学非合法化的逻辑却是继时的因果逻辑。因为这一逻辑悖谬,便有了语焉不详或自相矛盾的一系列问题,如既有的文学性泛化了,文学还有没有现实的属于它的属性;既有的文学性泛化了,是否就导致当下文学研究对象的解体;文艺学是研究文学的文学性的,文学性的泛化是否就意味着文艺学没有新的仍为文

学所专有的属性可以研究,因此也就只能是文艺学作为学科体系的走向溃散?这都是些关系到文学及文论领域学科命运的问题。

## 2. 文学成为文学性分享与社会生活成为文学性寓所

须予强调的是,形式主义批评学派,他们充分注意到文学的发展属性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对于这一属性的关注。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到形式主义研究目的时指出“我的目的在于研究文学理论的内部规律。[……]因此这部书全部用来研究文学形式的变化问题”(塔迪埃 19)。艾亨鲍姆在形式主义研究中坚持着一个原则,即“静态的文学丝毫也不存在”;蒂尼亚诺夫认为“作品的统一并不是一个对称的死板一块的封闭体,而是发展变化的能动的整体”;蒂尼亚诺夫不仅坚持文学进化理念,他还更深入到文学进化的历史性思考,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潮流,每一个文学潮流在一段时间内,都要从以前的系统中寻求支持点;罗曼·雅各布森论及诗的语言形式时,也特别强调其变化性都是“出乎意料”的,诗的不断语言形式之变,使语言承受了一种暴力。<sup>②</sup>回顾形式主义批评学派在对文学性的形式主义研究中所特别注重的发展变化立场,意在指出当下所发生的文学与文学性的争论中,以文学性的发展变化为理由把文学性从文学中泛化出去是违背形式主义批评学派基本主张的。即是说,在形式主义批评学派,他们深刻地注意到构成文学性的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着的,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文学性的存在。

提出文学性泛化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误解,即把概念的合于概念属性的变动性——这是分析哲学所特别研究的属性,判认为概念自身的否定性,而且这种否定又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把概念从其原生的领域体系及概念的逻辑体系中割裂出来,通过改变它原生体的方式将之进行异体置入。“文学的其他性质,如虚构、修辞等等,却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幽灵。影视、广告、大众传媒、公共表演等各个领域都渗透着这种文学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性的统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具有很多种文学性。一些文学性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终结了,而此外的一些文学性却得以进入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权力话

语的方式统治人们的生活”(王婷婷 53)。在这样的理解中,被设定的学术概念,从它们所由设定的学科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实体性的东西,它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可以游离出来,并幽魂附体般进入其他领域;而它一游离,它所原生并寄居的实体性的领域便崩溃或了结,它所重新附入的领域便立刻因它的附入而生机勃勃,获得了它所带入的属性。显然,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须予质疑之处在于从文学中已然历史地游弋出去的东西,何以仍必须称为文学性;文学何以因其文学性中的某些东西游弋出去就不再是文学,因此也不再为文学理论所研究;在概念实体化中领域被虚化,这时,是概念统治着领域还是领域统治着概念?其实,这类问题在正常的理论思维中并不难理清,因为旗帜鲜明的本质主义批判早已使概念统治生活这类提法的荒谬性变得不言而喻,这类提法所以能在当时的理论思维中发挥作用,是受了当时所预设的文学边缘化说法操控,这一边缘化说法认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文学边缘化了,但文学性却统治了生活,因此文学理论不应随文学的边缘化而使自己沦入理论边缘或成为边缘理论。相反,文学理论应热衷于研究回归生活中中心地位的文学性,从而使自己重归理论的中心地位,而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救赎。正是在这种理论救赎的紧迫感中,文学性发挥了把生活向着理论引渡的作用。关于文学边缘化说法,稍后专论。

## 二、文学与文学性争论的时代依据

探究上述文学与文学性争论的缘起,虽然这争论发生在文论领域,是文论的观点之争,亦即文论的研究对象之争,但其动因却在文论及其研究对象文学之外,概括地说,这乃是市场经济自行运作的结果。

### 1. 文学及文论精英身份的失落

精英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名称,并没有严谨的命名程序与命名过程,因此也没有这一名称的具有严格概念意义的外沿与内涵。这一名称在社会生活及不同活动中被较为普遍地使用,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是在大众文化兴起中为与大众及大众文化相区分而得以凝练的。在这样的凝练过程中,这一名称有了相对集中的所指,而它的所指在较大范围内的普遍认同,又以

与大众及大众文化的特征性差异为前提。大众是感性的、世俗的、变化的,精英则是理性的、超越的、持重的;大众是求新的、娱乐的,精英则是务实的、沉思的,这便决定了大众与精英的一个代表性差异,即前者更追求感性活跃的欢愉,后者更坚持理性精神的凝练。与之相应,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也就有了区分。当然,进行这样的差异性划定与区别性确认的,乃是精英群体的理性运作。

大众文化不断繁荣的当下生活,为精英群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且又可以自由选择的现实可能性。现实生活对于精英群体的选择以及精英群体对于现实生活的选择,在选择的自由条件是互为的,即双方对于对方的接受与适应。而互为主导方面,在市场经济不断繁荣的过程中,则越来越倾向于现实生活的、大众文化的市场需求。这种条件性的自由选择状况,决定着精英群体内部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实践行为模式的多元分化,这便促成当下精英群体生存状态的多样化。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精英群体所共同所持的精神理性领域,从而引发精神理性领域的震荡与分化。震荡与分化的结果,不仅有了精英群体现实生存状况的多样化,也有了精神理性在大众文化的市场需求中不同状况的着落,以及大众文化的市场需求对于这适应的或着落的精神理性的分享与进一步合谋。不过,就精英群体的群体特点而言,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在接受教育中的师承,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结构及人生理念,总体来说,是守持着理性的。如有的学者所说,人文精英群体所守持的理性,包括人文理性、历史理性以及实践理性。不过,当下所发生的大众文化市场需求对于精神理性与之相适应状况的选择性接受,却分明是理性对于感性的屈从,是感性对于理性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精英群体身份特征的理性的提升与超越,便在大众文化格外活跃的现实生活中丧失其合理性,并因此而失落。

当下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精英与文学理论精英,正是上述精英身份失落状况的承担者,而且,1980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处于政治敏感区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比起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要更为活跃,更令人们追随,因此也更多一些领潮人的气势——此前正宗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社会功能理论,把告知世人如何认识生活、教育世人如何正确生活作为当仁不让的责任,就

是他们优越的身份感的理论表述。然而,这样的一个群体,却在大众文化的喧嚣尘俗中,失落了精英身份,不得不去适应市场需求,不得不面对那些并未取得文学精英身份,并且按照既有精英标准根本不可能取得这种身份的后生小子、无才之辈,看着他们快乐地享受着精英们做梦都未敢求得的超级精英待遇,这该促发文学与文学理论精英们怎样沉重而不平的心情,当无须赘言。

## 2. 虚实恍惚的文学边缘化之说

引起文学与文学性学术争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文学与文论精英群体失落的沉重情绪作用下,文学生存及文论生存被边缘化的感受便被强化,由此有了哄扬一时的文学边缘化之说在文学与文学理论圈里引起的骚动。

### (1) 文学边缘化之说的缘起及其本义

追溯新世纪风潮一时的文学边缘化之说的缘起,恐怕当属奚密所著《从边缘出发》这本论诗的专著。该书作者的本义,是把传统的诗作为“纯文学”来谈,并论证诗这种“纯文学”以其“道德修养的基石、政治权力的阶梯、人际沟通最精致典雅的形式”(奚密2)而成为拒斥主流文化却又为主流文化不能奈何的艺术的“象牙塔”,在艺术的“象牙塔”中,诗以其对于先于语义又高于语义的语感的强调,以其超语义的创作实践,以及对于诗的语言独立性的追求,而使自己在中国艺术领域获得了宗教式的崇拜。多年中,诗都以其经典化的特点与自律性的坚持而成为不容侵犯的文学领域。这个领域,相对于主流文化,包括盛极一时的政治文化以及当下繁盛着的市场文化,它处于“边缘”地位,正是这一“边缘”的却又疆域分明的地位,使它获得了超越的优势,这不仅使它区别于其他文学,而且使它获有对主流文化说不的权力,并因此具有对于主流文化的独特的颠覆性。

显然,在奚密这里,“边缘性”是文学自律性的表述,这是承上世纪80年代文学自律性讨论进而进行的文体学的阐发。

据文学的实际情况而论,历史上的文学总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庙堂文学,它超越于尘俗之上,自足于艺术之中,它所依循与追求的是经过沉淀的确定的艺术格调与艺术形式,如诗的声韵格律以及作者前承于圣人的道德襟怀。这些东西由于是延续于史的,因此有其确定性与稳定性,它成为庙堂文人的标准与模式。另一种文学,是

市俗文学。市俗文学的特征在于它与它所在其中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现实具体性。什么成为现实生活的主流或主导,现实生活中人们关注什么,追求什么,什么是现实生活的规定性因素,文学就以其形象的方式密切地关联着什么。

不过,所谓庙堂文学与所谓市俗文学又并非截然划分,二者有相互融通的中介,这中介有两个方面,一是艺术自身的规定性,一是现实生活对于艺术的规定性。当处于边缘位置的“纯”艺术要真正成为艺术时,它便不能不向现实的市俗生活求借内容;同样,当市俗的艺术要真正成为艺术时,它也不能不向“纯”艺术求借艺术的形式,艺术的这种自身规定性,造就“纯”艺术与市俗艺术由边缘向中心,又由中心向边缘的彼此流动,并因此形成“纯”艺术与市俗艺术相互持续的不同的艺术层次。至于现实生活对于艺术的规定性,在于现实生活总是要在艺术中求得展示,现实生活的不同状况,规定着它对于艺术展示的不同需求。当市俗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格外活跃时,它要求于艺术的,便是后者切近现实生活的方面;当现实生活进入稳定发展的和谐状态,日常生活成为毋须特殊关注的常态生活,这时,艺术表现生活的完美形式便成为现实生活的关注。

由此可见,作为“纯”文学的边缘性,乃是文学艺术相对于现实生活的自身属性,文学艺术的自律性正实现于这一边缘性中。

这应该是新世纪初,在文学及文论界被最初论及的文学边缘之说的本义。

### (2) 文学边缘化说法歪曲了文学边缘之说

文学边缘化,一个化字,强调了文学的边缘属性及相对于现实生活的边缘位置的非自律的被动性。这成为一种被边缘的属性。显然,被边缘的属性与边缘的自律属性,虽然在“边缘”这一说法上看似相同,其实却大相径庭。

文学边缘化一词较为明确地提出是在2003-2004年,<sup>③</sup>但当时对何谓文学的边缘化并没有专论,在当时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与之相关的各种论文的关键词中,“边缘化”并未列入。因此可以说,边缘化的提法在当时只是文学状况的一种描述性阐发。从当时代表性论文的引证可以看出,这是对于奚密《从边缘出发》所提的边缘之说的接着说。不过,在接着说中,“边缘”之说的本义被改变了——“但到了20世纪,诗歌却丧失了

它的优越地位而成为一种边缘文体,个中原因值得玩味,但我认为当代社会诗歌的衰落,主要原因在于商业化和大众传媒的兴盛,并由此产生的消费群体对通俗文化的需求。”<sup>④</sup>这是一个笔锋突转,在突转中改变了边缘之说的自律性,本为自律性的“边缘”,成为被外部力量所边缘的属性。边缘化由此成为一种放逐,行使这一放逐的,便是“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兴盛”,便是随之而来的“消费群体对通俗文化”的需求。在这样的笔锋突转中,文学边缘化的提法对于诗的边缘性的理解是矛盾的,矛盾集中于诗的自律与他律之间。一方面,该论文认为导致诗这类“纯文学”边缘化的,是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社会生活现实;一方面,它又强调“纯文学”固有的边缘属性,是这种属性使它拥有了对于主流文化的颠覆性与对抗意义。显然,当时边缘化提法在阐发边缘问题时所表现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书写的逻辑问题,而更是当时文学及文论界对于文学自律性的体验矛盾。它不否认文学的自律性,但又从文学因其自律性而被放逐于边缘的理解,强调现实生活对于文学的他律性,强调自律必须合于现实生活的他律性。

(3) 文学边缘化提法相对于文学现实状况的虚实恍惚

文学边缘化提法在2005年酿成风潮。而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文学边缘化的过程自上世纪90年代便已发生,2005年之后的边缘化的普遍提法,不过是理论表述的滞后。此后国内不同规模的文学理论会议都有学者把文学边缘化作为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状况加以谈论,并据此进而论及文学该怎么办,文学理论该怎么办。一时间,文学边缘化成为思考与论辩文学问题的现实出发点。

当时的文学边缘化之说有三个要点:

其一,文学边缘化是文学在生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变化。此说充满了对于文学黄金时代的回味,在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为人们所渴求所神往,人们把文学作为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人们向文学求解生活,在文学中接受教育,在文学中澡雪人品,在文学中获得审美享受。那时,成批的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以能与文学结缘为幸,以自己竟能爱好文学而自豪,文学成为最能展示身份并充满趣味的随时有效的话题。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回味中成为神话。

其实,回顾中国百年文学状况,从启蒙到革命,从政治到自律,文学一直是磕磕绊绊地前行着,它不断地忍受孤独与寂寞、批判与放逐。这期间当然也有被抬捧的个例以及被热哄的阶段,但每当出现这种状况,基本都是由于文学充当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其实是一种服务效应。就此而言,文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中心。既然如此,相对于中心的边缘化又据何谈起?

其二,边缘化是文学遭受商业化与大众传媒挤压的结果。这种说法,是把自己圈入了一种机械的、具有物理学意义的时空意识中。“那些挤占了传统文学艺术空间的影视、网络游戏吸纳了大量的文艺因素;人文知识的各种话语中也存在着‘文学性’的表述;甚至日常行为也被日益‘审美化’,曾经高居象牙塔顶端的审美,曾经代替宗教和伦理成为人类精神栖居之所的审美,今天已被世俗化为‘欲望的感性显现’,成为商业消费的对象和商业生产的动力”(马睿18)。这段引文所表述的内容,在当时的文学边缘化说法中,是有代表性的。这类说法的要义在于人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人们先前用于文学的时间现在被影视游艺等占有时,文学就在人们的有效时间中退隐;同时,文学的资源是有限的,原属于文学的资源被商业活动及商品广告等占有,文学就因资源流失而枯萎;此外,文学的领地是有限的,当原属于文学的领地被各种各样的商品生产及商业消费所占领,文学就只能被放逐。然而,这种物理学意义的时空意识,即时空限定性与时空确定性,对于精神活动,尤其是对于以时空超越性为特点的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精神活动显然不相适宜。

其三,文学边缘化导致文学的终结。已故学者余虹对此阐发说:“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狭义的‘文学’置于边缘,又将广义的文学性置于中心,我名之为‘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统治’”(2)。终结一说,起于上世纪60年代后西方的理论思潮,终结不是了结,而是某一阶段的结束,同时,在这一结束中又孕育了新阶段的开始。对此,有学者曾作过精要阐释,“仔细琢磨,西方知识界热衷于命名各种‘转向’,‘后……’和‘终结’,看起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反观种种‘终结’图景,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赫然眼前。所以说谈论‘终结’,不啻奠基新起点”(周宪2)。余虹也是在这一重意义上运用

文学终结之命名的,其真实意思是说,既有的那种文学即所谓精英文学及其所处社会位置和所得社会评价,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已然失去了他们先前的兴盛与辉煌,但他们又以自己的黯淡,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这时代便是文学性统治的时代。这里的问题在于,西方的终结论是意指新阶段的奠基,而奠基者不管它还有怎样的活力,它都不再是主体而只能是主体之基。这种理解固然注重了文学在历史转型时期于各相关方面所应体现的转型性,但却忽略了文学作为一个自律性很强的艺术领域,也必有其稳定的延续性,而且这一稳定性即便在其转型形态中,也稳定地延续着。西方终结论是历史延续的线性关系论,它的合理性根基,在于黑格尔的理性发展的历史递进论中,即下一阶段总是上一阶段的递进性取代。这里的疏忽在于不同事物不同阶段的共时性并存。就文学而言,所谓精英文学作为所谓文学性的前段,并不会因文学性泛化而消融在文学性中或奠基在文学性中,相反,它始终以其文学的自律性而持存于现实生活,并且,这是不容取代的持存。

由以上分析可见,文学边缘化提法,从文学的历史属性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地位而言,从文学在市场经济繁荣中的现实状况而言,以及从文学转型的延续关系而言,均与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及延续状况缺乏实在的对应性,因此这是一个虚设的说法。但它作为一种说法,又被当做是文学现实状况的符合实际的表述从而用作文学与文学性争论的现实基点,这就使这一说法处于虚实恍惚之间,它使在文学与文学性争论中,坚持用文学性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的文学研究的主张,并没有据以立论的坚实的现实根据。

### 三、文学理论向现实生活领域 扩容的理论根据

尽管在文学边缘化的沉重氛围中用文学性解释文学理论向现实生活领域扩容显示着理论的仓促与混乱,但提出此说的学者们的理论敏感性值得称道,而且,这是面对现实生活实践的理论敏感性。他们是在整个文论界尚无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出于理论研究的责任感而仓促应战的。这不影响他们所敏感到的问题是确然的现实问题。

文学理论扩容的实践性运作发生于文学理论

研究对象由文学而向生活领域的扩展。这一扩展的实践根据是时代性的,它先于文学理论的思考而发生,并导致理论思考的仓促。这是市场经济及大众文化所引发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生活与文学间此前被差异性遮蔽的彼此相通的方面被突出与强化,并要求理论求解,而在这段时间及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与现实生活审美相对应的理论又处于匮乏状态,与之对应的生活及文论理论又相对贫乏,这便使得既有文学理论在文学与生活的相通性上,获得了转而研究生活的契机及必要性,而且,这对文学理论而言,又是在与生活融通中进行建构的良机。

那么,该如何理论地理解与对待文论向现实生活领域扩容这一现实实践情况?文学与生活彼此相通的方面被突出与强化,这些方面用“文学性”解释显得仓促,那么,这在理论上又该如何阐释?

#### 1. 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融通关系

文学与现实生活具有融通性,这在理论上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很透辟地谈论过这个问题,并很切实地将之融入他们各自的文学批评。

当下这方面的问题在于,融通着的生活与文学,其互指互代的实践根据是什么,以及如何对此进行理论确认。概括地说,生活与文学相融通于精神意蕴层面。文学与生活精神层面的融通性集中体现为二者的理解与体验具有同一性,简要说,即用于文学的理解与体验,也就是用于生活的理解与体验。当然,就具体文学作品而言,不同作品间有众多的理解与体验的差异性,并体现为接受条件或接受限定的差异性;不过,这类差异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复杂与千差万别。但就理解与体验的一般性而言,文学与生活具有充分的理解与体验同一性。英伽登曾用现象学方法分析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他在滤除文学作品具体化所造成的差异性理解之后,就文学理解的一般性阐释说:“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构成(a purely intentional formation),它存在的根源是作家意识的创造活动,它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以书面形式记录的本文或通过其他可能的物理复制手段(例如录音磁带)。由于它的语言具有双重层次,它既是主体间际可接近的又是可以复制



的,所以作品成为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an intersubjective intentional object),“同一个读者社会相联系”(732)。在这里,即在作品的意向客体中,创作者的生活理解与读者社会的生活理解形成主体间际的彼此的融通的社会性理解。

见于理解与体验的精神层面的融通性,使得文学与现实生活不仅形成一系列可供融通的实践取向,如二者的动力系统(文学创作的动力系统与生活实践的动力系统)、二者的审美系统、二者的传播系统等融通性实践取向。这类融通于精神层面的可融通的实践取向,提供着理论研究在文学与现实生活间相融通的根据。

## 2. 文学与生活的同构关系

文学结构总体说属于形式范畴,它包括文学的文体结构、叙事结构、抒情体验结构,文学生产结构,文学接受结构等。就此而言,原创出文学性概念的形式主义者,把见于形式的文学性确认为文学的特征与本质性,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应予否定的预设,而当下文学性的仓促沿用者们开掘了这个应予否定的预设,他们到现实生活中搜寻那些散落于生活的文学形式,再将之纳入文学性研究,并将之用于文论扩容。其实,在结构性这一点上,文学与生活具有同构关系。

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引申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强调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的意识形态性是通过社会知觉结构实现的;他认为艺术是复杂的社会知觉结构的一部分,它是社会知觉结构见于艺术的形态,理解艺术就等于理解整个社会过程。文学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因此,它们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韦勒克·沃伦曾谈到文学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即虚构,并就此指出,文学理论就是研究文学虚构的理论。虚构被认真地接受为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这里就有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同构关系在发挥作用。情感同构、社会关系同构、思维方式同构,基于同构,生活经验可以自由地成为文学接受的经验。

据此而言,在文学与生活的同构关系中,用于研究文学的理论也就可以转而用于研究与文学同构的生活。

## 3. 文学与生活的主体同一性关系

文学的人本主义的一个根本信条,即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意识的由来时,特别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1)。后来,特里·伊格尔顿对这一人的意识和人的意识形态的提法予以阐发,提出正是在把握社会意识形态的人的出发点这一基础上,文学和社会生活体现出过程同一性,“所以,理解文学就等于理解整个社会过程,因为文学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的灵感的产物,也不是简单地按照作者的心理状态就能说明的。它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它们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231)。人是以其意识及意识构入的意识形态而成为生活主体的,并且,就是在这同一主体性上,人成为文学世界的主体。生活——人——意识——意识形态——文学,这是一个连贯的环合过程,生活与文学在人的主体性中,在这个过程的起点与终点上环合为一体。文学作品中的及人的一切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及人的一切,确定着彼此环合融一的关系,这个过程中,知觉形式作为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发挥着使二者相环合的作用。

在文学人本主义的人的主体性上,文学与生活形成文论研究的兼融性与同一性,文学理论向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领域扩容,便在大众文化语境的作用下得以实践地发生。

### 注释[Notes]

① 文学理论扩容与十年前进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有关,那次讨论的发起性文章是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1(2002):166-72。此后,文学性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属性被重视,进而引发文学研究对象的争论。2011年,陶东风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深圳会议上重提这个话题,并进一步呼吁文艺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注,将之提到走出精英主义,坚持批判精神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少问题被文论界所研究,文学理论扩容由此成为现实。

② 以上所引艾亨鲍姆、蒂尼亚诺夫、雅各布森关于文学及其形式不断变化发展的观点,分别见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19、

13、26、33。

③ 2003-2004年提出文学边缘化之说的主要有两篇论文,即马睿“文学性扩张与文艺学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8-26,及马征“‘纯文学’之辨与诗学话语反思”(这是一篇参加2004年“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④ 此观点参见马征“‘纯文学’之辨与诗学话语反思”,《“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1(2004):65。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三卷,朱立元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Eagleton, Terry.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20<sup>th</sup>-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 Classics*. Vol. 3. Ed. Zhu Liyu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冯黎明“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悖谬”,《中外文化与文论》第4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Feng, Liming. “Literature and the Paradox of Literary Theory.” *China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Vol. 4.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Vol. 1. Trans. He Lin,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二卷,朱立元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Ingarden, Roman.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Works of Art.” *20<sup>th</sup>-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 Classics*. Vol. 2. Ed. Zhu Liyu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马睿“文学扩张与文学先于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

[Ma, Rui. “Literary Expans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ture Preceding Self-Salvation.” *China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Vol. 10.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Marx, Karl Heinrich, and Friedrich Von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

[Tadie, Jean-Yves.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 Wu Zhongyi.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王婷婷“论王小波对文学性问题的思考”,《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

[Wang, Tingting. “Wang Xiaobo's Reflections on the Issue of Literariness.” *China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Vol. 10.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2003. ]

奚密《从边缘出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Xi, Mi. *Start from the Margins*.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余虹“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

[Yu, Hong. “White Literature and Literariness.” *China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Vol. 10.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2003. ]

周宪 许钧:终结者译丛序,丹尼·贝尔《意识形态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Zhou, Xian and Xu Jun. “Preface to Terminator Translation Series.” *The End of Ideology*. by Daniel Bell. Trans. Zhang Guoqi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House, 2001. ]

(责任编辑:王峰)